



中国读本

中国古代商业

吴 慧 著

商业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在远古时期，中国便有了商业萌芽。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应的商业政策和传统的商人精神……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读本

中国古代商业

吴慧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商业/吴慧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商业史—中国—古代
IV. ①F7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0944号

中国古代商业

著者	吴慧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78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0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09-9/F · 329
定 价	16.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萌芽之始，成长之初

- 远古至夏商西周的交换与商业 1
- 一 远古的物物交换 2
- 二 商、商人、商业 5
- 三 西周的商业 8

第二章 第一次飞跃

-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 11
- 一 春秋战国商业的新发展 12
- 二 商税的征收和列国对商业的重视 17
- 三 货币、高利贷和土地、人身、劳动力的买卖 19
- 四 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22

第三章 发展的“马鞍形”

- 汉唐的商业 27
- 一 汉唐商业的概貌 28
- 二 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和市场上流转的主要商品 36
- 三 城市商业与农村商业 40

第四章 新阶段的新面貌

- 宋元的商业 49
- 一 宋元商业的概貌 50

二	市场商品和贩运贸易的变化	56
三	城乡商业的发展，市场形制的演进	58
第五章	夕阳无限好	
——	明清（前期）的商业	65
一	明清（前期）商业的概貌	66
二	大发展的商品经济	72
三	繁荣的城市商业，活跃的农村贸易	76
第六章	扩大外延，双向交流	
——	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	81
一	汉唐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初步发展	82
二	两宋榷场贸易的开展，宋元对外贸易的兴盛	88
三	明清时期民族贸易蒸蒸日上，对外贸易 曲折多变	92
第七章	人物、集团	
——	古代社会的商人	103
一	新兴的自由商人及其代表人物	104
二	富商大贾和中小商人	110
三	商业集团的形成，新型商人的兴起	116
第八章	抑商与容商，轻商与重商	
——	商业政策和思想的嬗变	121
一	重农抑商政策	122
二	商品专卖制度	126
三	两种对立的商业思想	130

第九章 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

——值得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139
一 立身处事，爱国敬业	141
二 勤劳刻苦，简约朴实	144
三 重在信义，贵在和协	147
四 出奇制胜，心志专一	153

第一章

萌芽之始，成长之初

——远古至夏商西周的交换与商业

在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今天，提到商业，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可是，到底商业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不同时期各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这一个历史过程却很有一些复杂的内容。要了解其中的情形，得先从商业的“萌芽”和成长的初期谈起。

一 远古的物物交换

商业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其初始的萌芽状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的物物交换，后来才有发展了的交换形式——商业。

最早的交换发生于原始社会。距今六七千年，河南、甘肃、陕西属于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都有产于沿海的海贝发现（装饰用），这就是自外地交换而来的物证。当时的交换尚带有偶然性。至距今 5000 年的原始社会晚期，畜牧业与种植业分工，手工业（制陶、青铜）也相继与农业分离，交换相应扩大。《易·系辞下传》所说的：“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即表示交换已比较经常，并且有了比较固定的

时间和场所。古书中还有“因井为市”的传说，交易常在井旁进行，以便于汲水供人畜饮用或将货物洗净。所以后世常把“市井”连称。

交换初起，发生在生产门类、自然条件不同而拥有不同产品的氏族、部落之间，由氏族、部落首领为代表，对外进行交换。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舜就是擅长于从事交换活动的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传说舜曾“作什器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就时于负夏（今河南濮阳附近）”（《史记·五帝本纪》）。“就时”即乘时逐利进行交易的意思。又说舜“贩于顿丘”；“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尚书·大传》、《尸子》、《帝王世纪》）。顿丘在今河南浚县，传虚在今山西运城。顿丘缺少一些物品，所以“买贵”，舜就在这里出售为人所需的物品——主要是舜部落的特产，上好的陶器以及其他“什器”；而传虚当地有些产品很多，所以“卖贱”，舜在那里以赊购（债）方式收进那些产品——主要是河东的池盐。舜利用两地东西的贵贱，从中获利。为了掌握河东池盐，舜在当上尧的继承人后，把政治中心迁于靠近盐池（名解池）的蒲坂之地。今蒲坂城中尚有舜庙，盐池所在地的解虞县（现为运城）带有“虞”字，也都与舜有关。舜在位时更花力气发展食盐生产。相传舜作五弦琴，曾弹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盐法》）夏季薰风及时南来，池盐就自然结晶，部落的财富就可增多，熟悉食盐

交换之利的舜，对池盐生产的好坏当然要加以极大的关心了。

舜命禹治洪水，禹曾设法组织粮食在地区间的调剂，通过交换以解决洪灾后人民的生活问题。《尚书》记载禹所说的“懋迁有无，化居，烝（zhēng）民乃粒”，即指此事而言。懋（贸）迁即贸易；化居，“交易其所居积”，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调有余相给”；蒸，众多；乃粒，乃有粒食（粮食）。后世称做生意为“懋迁有无”即源于此。

交换本来先起于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同一氏族部落内部交换物品的是后来之事。由于制陶器、铜器、玉器需要比较专门的生产技术，需要长期固定的操作人员和合适的原料，部落中的某些氏族、家族以至家庭，逐渐成为分工专门从事某项手工业的氏族、家族和家庭；牲畜更日益增多地转由个体家庭放牧或家内饲养。至此，交换不但对外，而且也在部落、氏族内部发生。在交换中占有利地位以至握有权力的新兴家族和氏族首领不断富裕起来；交换还促进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成为它们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些都为私有制的逐渐形成，原始社会的逐渐解体打开缺口。可以说交换实是推动私有化、瓦解公产制的催化剂。禹死，其子启接位，开创“家天下”的夏王朝，奴隶制国家宣告确立。

尧舜时以珠玉为上币，牲畜、生产工具等成为一般的交换媒介。“夏后以玄贝”，夏代用海贝（染黑色）为货币，以后贝币一直广泛使用，直至被金属铸币取代为止。由物

物交换到交换媒介——货币的出现，是交换向前发展的标志。原先物物交换时是买卖同时同地发生，有了货币，一买一卖就分解为两个不同的过程了。

二 商、商人、商业

物物交换，以及通过货币由生产者与需要者直接见面的交换，统称直接交换，都不能算是商业。当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区不断扩大，不可能产需都直接见面时，一部分人就从社会上游离出来专门买进卖出，充作产需双方的中间人；组织交换成了他们的职业；有了这种社会分工，商人和商业于是产生。为什么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和行业称商人和商业？原来这和历史上的商朝有关。

在夏代，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其部落首领王亥，代表本部落，常亲自带着牲畜等物同其他部落开展贸易。在一次到黄河以北易水附近的贸易中，狄人有易氏杀了王亥，夺走了他的牛车和“仆牛”（牛是交易品，仆是作为交易品或担任贩运劳动的奴隶），引起了一场部落纠纷。王亥之子上甲微为报父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夺回



商人的鼻祖王亥

了牛车及其他财物。商的势力由此扩展到易水流域。由于王亥始“服牛”，有利于商族的发展，商王朝兴起后其后人一直隆重纪念这位先祖。

商王朝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大国（前 1711—前 1066）。商统治者能取西方之玉石，采南国之铜锡，获东海之鲸贝，来北地之筋角，交换活动十分广泛。但此时远离生产、鄙视劳动的奴隶主，已无人愿意像过去部落首领王亥那样，不辞辛苦，不避风险，亲自去主持远距离的交换活动；交换之事已改由其手下的小臣（奴隶管事）率领奴隶去具体操办。这些人扬帆驾车，一出去就是好长时间，路上总是在盘算如何“得贝”、“朋来”（贝朋都是货币，五贝串成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名为一朋，商代的贝白色），希望如意顺利，“朋从尔思”。他们“不耕获，不菑畲（菑，zī，初耕地；畲，yú，开垦三年的熟田）”，成了专门搞交换的人。由于役使奴隶跑买卖非常有利，在商朝上流社会里，这一行当就很受重视。有的大贵族更以交换为其主业。现存的商代的一个饗饗（tāo tiè，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恶兽）纹鼎的内部，刻有像人荷贝立在船里的铭纹，旁边还有一人以手划船的形象，一个人挑着货币，坐着船到别处去，显然是去做买卖。这只精美华贵的鼎的所有者，自豪地把做买卖的图形，用作自己官职的徽章和行业的标记了。

商统治者所居的城市，称“邑”，里面有“市”、“肆”，为往来做买卖的人聚集之处。相传商纣王时姜太公——吕望就在朝歌和孟津的市肆内干过“负贩”、屠

宰和卖酒的营生，这是从事交换的平民之例。后来这位做过买卖、富有社会经验的吕望，辅佐周武王起兵，终于推翻了奢侈暴虐的商纣王，由周族统治的新王朝——周朝代之而兴（前 1066—前 770，是为西周）。原先居统治地位的商族人沦为周朝的种族奴隶或虽保持平民身份而受严格控制。

商遗民的境况大为窘困，许多人为了贴补家用，只好听从周公的告诫，以跑买卖作副业，在农事空隙牵牛驾车到远方去做生意，获利回来，父母欢欢喜喜地为他摆酒做菜来庆功（《尚书·酒诰》）。在过去“殷人重贾”、“殷人贵富”（殷即商）的社会风气熏陶下，商遗民中的许多人就干脆以出门跑买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业。本来商族人行旅贸易于四方，也常到毗邻周族所居的地区去做买卖，在周人心目中，买卖人就是商族人。商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更多了，商族人和买卖人交织在一起，给人们的这个印象更深了。以后，商族和周族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非商族的买卖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买卖人虽已未必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却不分种族，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起先人们只把跑贩运贸易的人叫做“商”，坐市肆售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商坐贾”，后来逐渐把他们统称为商人了。现在我们之所以称用于出售的生产物为“商品”，称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为“商业”，就是从“商人”一词沿用而来的。商族、商人、商品、商业，都和古时的商朝有历史渊源。

三 西周的商业

西周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目的是通四方之珍异，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市场上主要商品不外是奴隶、牛马、珍宝等。国家对市场有一套管理制度，规定体现贵族地位等级和权威力量的礼器和兵器不准入市；贵族买东西只能通过手下的管事和仆役人等去办，自己不能入市，以免有失身份。市设专职官吏——“司市”来进行管理，下面有：分区管理、辨别货物真假的“胥师”，掌管物价的“贾师”，维持秩序的“司諲（bào，猛兽）”，稽查盗贼的“司稽”，验证“质剂”（契约），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征收商税的“廛（chán，市内房地）人”。《周礼》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官府管理市场是为了使交易规范化，防止偷抢欺诈等事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持物价的稳定，更好地满足统治阶级对“货贿六畜珍异”的需求。但也注意了度量衡是否公平，质量规格是否中式，对一般消费者也有好处。这套做法一直为后世所仿行，影响久远。

西周使用大量的铜铸造礼器、兵器、工具、农具和货币（仿农具的铜铸货币叫做“布”，《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个布即是布币），因此对铜料的需要十分迫切。“大赂南金”、“金道锡行”[《诗·鲁颂·泮水》和金文曾伯簠（fǔ，古代食器，青铜制）铭]，铜锡的交易或入

贡向来是同南方（荆扬、淮夷）物资交流的主要内容。周昭王时南方以楚国为首的方国部落起来反周，昭王率兵伐楚，中道中楚人之计（以胶船进王渡江，至江中胶解船沉），“卒于江上”，六师丧亡。这件事在经济上与争夺铜的资源有关，由此也可见铜于日常在交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统治者对可作贵重饰物，兼充“上币”的美玉也极感兴趣。穆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阻碍了周朝和西北方国部落的来往，穆王西征犬戎，重新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八骏日行三万里”，行踪直到今新疆中亚之地。这位大旅游家“载贝万朋”，换取昆仑（今和田、叶尔羌一带）的玉石，发展了中原和西方的通商关系。



布币

在昭、穆肆意搜求铜、玉、珍奇方物的同时，奴隶逃亡，田地荒芜，奴隶制的统治发生了危机。一些小贵族改用收租的封建剥削方式开垦私田，由经营农业而致富。还有些人（大都由管理官营工商业的小官转来）则招人开发川泽，成为新兴的工商业者。“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十月之交》），旧贵族没落破产，新有产者暴发勃兴——被称为“富人”、“富子”。《诗经》的变风变雅，即是西周中后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映。而铁器的推广使用，正是这些新兴的农业和工商业经营者得以改用封建剥削方式的契机。奴隶社会内部封建制萌芽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

身份不高的新兴的农业和工商业者构成“国人”中间的一个主要部分，使最高统治者又是羡慕又是担心。酷爱财货的周厉王，为了抑制这些庶姓家族的经济势力的增长，决定加强对农业、工商业和山泽的控制。对山泽之利（中间就有对铁的开发利用）更完全掌管起来，不容私人染指。这一全面垄断的“专利”政策，损害了新兴的工商业主的利益，对于与新起的铁器制造业有关的一大批手工业者及商贾和用户，尤其有直接的不好的影响。从平民到中小贵族纷纷起来反对，公元前841年，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终于爆发。“暴虐侈傲”的周厉王狼狈出奔，最后死在彘（今山西霍县）地。这次国人暴动正是带有封建制因素的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主同旧的奴隶主大贵族之间的一次较量，它加速了西周奴隶制走向灭亡。

第二章

第一次飞跃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